

契诃夫的小狗和福楼拜的鹦鹉

□李伟长



青年作家常被批评不关注现实,不关注时代,不关注生活,这是一个偏见。哈罗德·布鲁姆有个观点,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两个传统,一个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传统,另外一个就是契诃夫的传统,可以唤作现实主义,或者遵从现实生活逻辑的写作方法。卡夫卡的传统到现在正在慢慢消失,写作到最后就接近于哲学的边界,用文学方式讨论的问题和用哲学方式讨论的问题慢慢趋同。所以布鲁姆把乔伊斯这样的作者,也归到契诃夫的传统中来,当然乔伊斯不一定会同意这样做。如果从契诃夫传统的角度,看待目前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,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,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有了这个基本判断,我们才能准确地谈论其他的技术问题,譬如如何进入传统的现实生活,如何进入超现实的虚拟生活。

关于社会和现实生活与文学的关系,《文心雕龙》里面有专门论述,有一章叫“时序”。“时序”所论述的基本问题,就是写作和社会变迁、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,所谓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。世情与时序这两个词,有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特点。时序怎样,与国家相关,也与国家高层的文化倡导有关。世情如何,与社会生活的流动变化紧密相关,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文论,不管是现实主义写作还是现代主义作家,在处理个人写作与时代的关系时具有共识。诗人奥登就认为,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,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。有了这个共识,我们才可能修订不必要的偏见,不会轻易而武断地说青年作家不关注现实、时代和生活。

如何面对现实生活,如何发掘书写生活中的崇高和力量,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幽暗和苦闷?就得忠于某些事实,忠于某些情感,也忠于幽暗的自己,从而找到孤独个体与现实生活的通道。最近在读几位青年小说家的作品,发现各自都建造了有效的密道。哲贵写了系列商人小说,他不仅写清楚了商业的内部,写清了金钱是如何来的,商人是怎样成长为商人的,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将遭遇哪些精神困境,更重要的是哲贵用这些语境,

准确地回应了小说家与时代的关系。董夏青青的《科恰里特山下》将眼光放置在戍边的军人身上,发现身处特殊情境即不平常的生活中的平常人性,这部分人性既有始于责任的力量,又有遵循生活河流本身的明亮。在周嘉宁的小说集《基本美》中,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。那些与时代保持着“脱臼”一般联系的年轻人,经历着疼痛,渴望靠近,客观上又有疏离。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,回应个体与时代的关系,这是文学自身的必然需求。

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生活,保持忠诚,写作才可能变得真诚,才可能捕捉并点亮那些生活细节,同时赋予这些细节以力量和意义。盖伊·特里斯的非虚构作品《被仰望和被遗忘的》,写了无数的纽约的普通人,其中写了一个在联合国旁边刷鞋的人,有个小细节,这个人会用27门语言做生意,这27门语言只会说一句话:先生,擦鞋吗?一个细节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,在不同作品中的反映完全不一样。比如契诃夫的《牵小狗的女人》这篇小说里,有一只小狗,就是它开启了故事,让两个人发生了联系。如果没有这只小狗,这对男女也许不会如此合理地说上话。还有福楼拜的中篇小说《一颗纯朴的心》,堪称超越时间的经典,写尽了时代中普

通人的生活。福楼拜在小说中写了一只鹦鹉,就是那个老人喜欢的鹦鹉,鹦鹉由此成为谈论福楼拜其人其作无法忽略的经典细节。为什么是鹦鹉?有何象征意义?英国作家朱利安·巴恩斯专门写了一本书,就叫《福楼拜的鹦鹉》,从鹦鹉开始以小说的方式为福楼拜立传,也探索福楼拜的心灵世界和小说技术。

一个称职的评论家,需要发现契诃夫的那只小狗,发现福楼拜的那只鹦鹉,发现纳博科夫的子弹(《洛丽塔》中那神奇的三枪),就像我们面对青年作家,同样需要发现青年作家和这个时代建立联系的细节和通道。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,和时代发生关系,也和身边的生活发生关系,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对青年作家来说,构造这些细节恐怕不仪事关才华,也事关小说技巧。

譬如我们现在过于强调个人经验,但是经验和小说之间就隔着一个技巧。经验能否变成小说,需要技巧的助攻。何况经验因为时间的加速度,其价值变得不如从前。从本雅明的《讲故事的人》后,很多作家都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。但其中显然有别,小说家不是讲故事的人,而是创造叙述者的人,由叙述者去讲故事。叙述者成立,其他就成立了。创造叙述者就是一个技术活儿。讲故事的确是一个传统,在经验不能共享的时间中,故事可以承担经验分享、知识交流以及道德教化的作用。问题在于,如何编一个故事现在变得过于迫切了,以至于编剧出身的罗伯特·麦基撰写的《故事》成为小说家写小说的案头指南,就多少显得本末倒置乃至有些滑稽了。

如果说面对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生活,作家还有许多有效的办法,面对超现实的生活呢?比如发生在虚拟世界中的生活和日常,尤其是现代人通过智能载体进入虚拟世界,进入游戏世界,并且在那里构建日常生活开展对话生成故事时,即当虚拟世界变成真实的一部分后,小说家的确还有功课要做。因为契诃夫的小狗和福楼拜的鹦鹉这样具有文学意义的载体,可能就变成了虚拟现实中的一个游戏装备。

认识和把握作家所处的时代,是写作上的一个根本问题。写作者不管身处哪朝哪代,哪国哪区,都要琢磨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,在当前的语境里如何呈现这个时代。我个人认为,只有针对我们时代时所存在的问题,进行思考和改进,才是真正认识和把握。当下,高速发展的物质生活和数字化科技的应用,对人际关系、社会分工、城市和乡村的改变等等,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。时代的大潮在我们眼前滚滚而行,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、融合及与之相关的抗拒、接受、反思,都与我们息息相关。我们感知到了乡村经验的流逝和更新,也体会到了城市经验的膨胀和自我消化;既体会到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带来的便利,也感知到了膨胀的物欲被挤压被丢失了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、疼痛和渴求。但就在如此丰富的境遇下,很多作品呈同质化的“室内剧”状态,究其原因,可能有以下几方面。

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现有体制所给予写作者的既得利益,使得人们的忍饥耐苦的能力减弱,也使得写作者和社会的紧张关系降低。这就使得作家满足于在温湿度适宜的房间里隔窗观望,即使意识到弊端所在,也缺乏走出去、扎根下去、深挖深究深体验的精神,自然阻碍“元素材”、“元经验”的获得。满足于便利的“二手经验”或“多手经验”。当意识到发声、深究、用赤诚的态度进行呈现会影响自身优裕的现有生活时,很多写作者也会在这种矛盾下做“明哲保身、智者沉默”的选择,绕道而行。

文学作品自身经济价值的低廉和衍生品——被改编成影视等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,与精英意识精品意识的缺乏相辅相成,彼此媾和,相互衍生。利益让操作者只注意收视率、购买率、点击率等,为达到这些目标刻意迎合人们消遣娱乐的心态,肆意宣传,大力制作,最终形成长久性的诱导。民众被诱导的同时其实也是国民素养被物质化、欲望化悄悄塑形和锁定的时候。作家作为民众的一员,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改变,讨好的、渴望被改编、被大众接受、通过文学发家致富的心态,将写作之笔伸入的方向扭转。

或许是由于文学的神圣性逐渐消失的原因,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赤诚度在减弱。当一个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或即将创作的作品,缺乏类似于信仰的赤诚度时,作品的品质自然就会受影响。尤其是在国人的目光停留在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字

□东紫



和影像制品上时,当作家自己意识到自身的文学创作,不但极有可能被浩瀚的文字淹没,甚至沦落到了“自己和自己玩”的状态下,那种穷其生命,呕尽心血要创造出珍品的动力就不足。

这种种的缘由,让许多作家满足于坐在空调房间里,在电脑前轻轻滑动鼠标,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受众的喜好,凭借自己的智识进行“码字”。

“这样的作家会一次次地拒绝书写饱含激情或者充满观察细节的语段,其结果是他们的作品极其乏味。”这话是美国作家弗兰纳里·奥康纳说的。她说过的另一段话,对“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”,该是最接近本质的回答。她说:“事实上,收集素材是小说家的一项最基础也最卑微的工作。小说就是关于任何人生于尘世的事情,如果你不想搞得自己满身尘埃,那你不应该奢望着写小说,写小说不是一份你所认为的‘体面’的工作。”

“旁观尘埃”和“满身尘埃”决定着一个作家是否真正地了解笔下人物的生活、情感和思想。用卡夫卡的话说是“抚摸世界还是在把握世界”。李敬泽在《论小说的思想性》一文中说:“不了解生活,写作就没有血肉,没有思想,写作就没有灵魂。一个作家要穿越复杂的表象,把人们心中有但笔下无的东西披肝沥胆地说出来,这个‘穿越’说起来容易,实际上大难,是作家与生活、与他人、与自己艰苦的对话过程,这个过程中,作家必须是真挚的对话者,是明了世事人情的对话者,又是一个有思想勇气和思想深度的对话者。”在这里,“真挚”二字是写作者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写作态度,它决定了作家是“旁观尘埃”还是“满身尘埃”,是“抚摸世界”还是“把握世界”。是诊治写作问题的“药方”,是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前提和根本。

战争小说与现实主义

□西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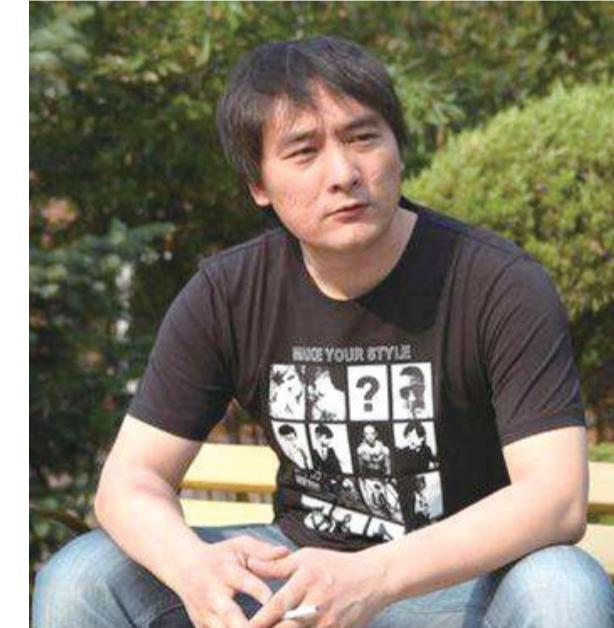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年来,除了叙写当下军旅现实之外,我还写了一系列中篇战争小说,包括《乙日》《死亡重奏》《黑镜子》《炸药婴儿》《无名连》《洞寺》《理想国》《拷问》等,内容主要围绕近现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战争。有的已经发表,有的即将发表。开始写这些中篇小说时是不自觉的,似乎仅仅由于我身在军旅,接触到的故事多与战争有关。但是后来,我猛然间意识到,近现代以来的战争,从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,再到抗日战争、朝鲜战争等等,异常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,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,战争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改变比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、哲学宗教,比德先生、赛先生,都要更猛烈、更彻底。它迫使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,仅仅依靠“心”是不够的,而必须研究心以外的世界,比如现实,比如人生,这些在以往中国人看来属于形而下,属于器物,属于幻象,属于无常,因而多少有些蔑视的东西。它还迫使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,如果不直面这些心外的世界,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。如果说有一种现实主义,那么,战争就是一种最现实的现实主义。通过沉思战争,我们多多少少能够领悟到现实主义的意蕴,从心灵深处,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。

战争是中国人的灾难,也是中国人的导师。它险些摧毁我们的灵魂,却使我们意识到了尊严的可贵。在一系列战争构成的精神史之中,我们可以看到,心与物的天平逐渐发生了改变。中国人意识到了宿命的可怕,但不再屈从于它,而是努力改变它,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思考战争,就是思考死亡;思考战争,也是思考新生。改变命运、改造现实的过程绝不是轻飘飘的,而是充满着流血牺牲,充满着痛苦挣扎,同时也充满着对新生的渴望。每一个参与到战争中的人千差万别,面貌不同、性格不同、知识不同,对世界的理解也不同,但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。死亡是一道黑色的闸门,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迈过去。这个时候,每个人都会问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,那就是,什么样的未来是值得牺牲生命去争取、去捍卫的?

文学如何认识和书写时代生活

□张楚



托尔斯泰记录了属于自己的时代,当我们阅读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时候,我们知道在19世纪,俄罗斯人各个阶层分别住什么样的房子,睡什么样的床,穿什么样的鞋子,谈什么样的恋爱,追求什么样的理想,苦恼什么样的生计,以及为了说不清的一切纠缠什么样的人生。而我们阅读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时,我们了解了法国的乡村种什么样的树、腿断了如何医治、楼有几层、有什么谋生的行当、农业展览会在当时起什么样的作用、一个年轻男子为何要娶一个50岁的老寡妇、高利贷是如何一点点把一个女人逼得服毒自杀,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,也就了解了艾玛为何会是艾玛,艾玛为何喜欢不靠谱的男人,艾玛为何自杀,了解了当时的法国乡镇是如何的乡镇,它与当时的巴黎有着如何的区别,换句话说,我们也不知不觉了解了法国的社会。所以,当文学作品在自己的逻辑范围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,它已经讲出了关于时代的方方面面,或者时代的横切面、时代的症候与模糊的未来之路。同样,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瓶梅》《三言二拍》也为我们真实地勾勒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乡村图景,中国人性的渐进、艰难缓慢的变化,在看清那个时代的同时,也看清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目、我们自身的图景和我们展望的未来。文学在认识和书写庸俗的、灰暗的、明亮的、不可抗拒和不可撤销的生活时,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记录时代、警醒后来者的作用。王国维曾说,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文学无论是观察现实还是重现历史,都天然与时代发生着或明显或隐蔽的联系,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,文学都真切地表达着对时代直接或婉转的认知。

而文学书写时代生活的方式,毋庸置疑就是作家自身书写时代生活的方式。这种方

式受书写者眼界、胸怀、情怀和阅历的影响。一个书写者如何才能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桎梏、用更高远、更睿智的方式去讲述天然属于时代的故事,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所以,作为一名写作者,能把自己时代的故事、事件、甚至是新闻以文学兼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,已经是一件艰难的任务。我崇拜那些为时代塑形、为人物“立传”、为普罗大众呼喊的作家。而这样的书写者,在他所属的时代里,也会是少数。

我在县城生活了将近40年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、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条河流、每一栋新起的楼房和每一家新开的店铺,我都会留意到,他们就像是我的亲人,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让我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人情的冷暖。在这里,我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,他们是我的朋友,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、行业,有公路收费站站长,有烧烤店小老板,有养殖

观赏鱼的场长,有镇上的团委书记,有开微信商店的商人,有清洁工,有房地产开发商,有理发店老板,有装修工程师……可以说,我的日常生活,就是跟这些朋友一起度过的,我熟悉他们的生活境遇、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当我书写他们的故事时,我有种天然的自信。可是,难道这种天然的自信不应该值得怀疑吗?我真的能写出一个个立体的、有血有肉的人吗?我真的能在这种书写中,勾勒出他们灵魂的波动与曲线,呼喊出他们内心最隐秘的甜蜜与疼痛,从而建立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和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吗?这种地域上的“小”和“窄”,是否束缚了对人性与人心的体察和体恤?这个疑问纠缠了我很久,也让我在反思自己的写作中间接地反观了他人的写作。我发现,地域无论大小,人口无论多少,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,人在千百年的变化中,最基本的精神属性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我所熟悉所熟知的这些人,虽然都是普通人,但是都

有着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处世逻辑,套用福克纳的话讲,如果能将邮票大小的地方写透,能把这些貌似简单的“人”的荣誉、自尊、怜悯、公正、勇气与爱写出来,难道不是某种逻辑上的自我成全吗?这么简单的问题,我竟然想了很久才想明白,才有勇气继续自己的书写。

前段时间偶然读到一位老师的话,说的是,一个小说家或文学家,不管他写的是什么题材,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,是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,是白领题材还是平民题材,我想当他有力地写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,当他把这个灵魂摆在这里,把这个灵魂的复杂性带着疑问摆在这里,使其他人感受到震动的时候,也就是他和这个时代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和共鸣的时候。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。我期待自己能写出这样的灵魂。

“现实题材与青年作家座谈会”发言摘登